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人物春秋】	犟人杨超	高越农
【追根溯源】	民粹主义思想与文化大革命运动	刘建国
【劫后反思】	红卫兵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希望？	丁晓宇
【一家之言】	我的文革反思	朱永嘉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人物春秋】

犟人杨超

• 高越农 •

本文的主人公是笔者不久前采访的清华学子杨超。我把他称为犟人。在一个专制社会里，犟人除非飞黄腾达，一般是不见容的。

本文讲述杨超不见容于1952年后的清华园、不见容于改革前的“新中国”的故事。

这本《清华文革回忆反思文集》的主要背景是清华园。文革浩劫，在清华人的心灵里，留下了怎样的哀痛和教训，在《文集》里已有记述。

但是，在清华园经历文革的清华人毕竟是少数。我们也需要关心，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清华人是怎么熬过文革的？作为一个例子，且看犟人杨超的传奇经历。

一、杨超的身世——父亲杨逢挺与其同乡蒋南翔

杨超系江苏宜兴人，1937年生。其父杨逢挺（1907—1973）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1年毕业，因为当年相当高的淘汰率，他是该系这一届里唯一能够坚持完学业的毕业生。因此，他曾得到叶企孙大师的一对一授课，耳濡目染。叶企孙在阐明物理系的教学理念时说过：“在教课方面，本系只授学生以基本知识，使能于毕业后，或从事于研究，或从事于应用，或从事于中等教育，各得门径，以求上进”。可见他对于人才培养的极度重视。1937年，在叶企孙推荐下，杨逢挺到江苏省四个优秀中学之一的上海松江中学教理科；1945年应聘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后任理科主任。1949年初，国民政府在教育界“劝赴台”的上中教师有朱凤豪先生和杨逢挺，他俩都拒绝了。1955年被评为上海市第一批优秀教师。他于1956年由校友陈光祖校长做介绍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年公开出版的上海中学介绍里，均是历史上的十大名师。1956年调任上海师范学院筹建物理系，终身从事教育工作。

在杨逢挺毕业的翌年，蒋南翔（1913—1988）考入了清华。他与杨原来就是同乡，两家同村，且宅院紧相毗邻，都是大户人家。现在，一个刚毕业不久，另一个就踏入了校门。这个出校那个进，似是无缘却有缘！

蒋南翔1952年入主清华后，曾两次亲自到上海中学，邀杨逢挺回母校共事，但后者以‘不想再动’为由婉谢了；蒋的此举，除了年少时的情谊外，主要还因为：1935年蒋作为‘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度被当局拘捕，杨逢挺联络了在京的宜兴同乡，联名向清华校长和当局担保，并接蒋回校。

从1954年开始的五年大学生涯里，杨超遭遇的校长又正好是这位蒋南翔。

在上海清华校友会文章《叶企孙教育思想的传承者——访杨逢挺之子杨超》里，作者杨洋说：“杨超学长……一开口就抛出了一个陌生词“量子纠缠”。这本是量子力学的一个概念，指有共同来源的两个微观粒子之间存在着某种纠缠关系：不管它们被分开多远，对一个粒子扰动，另一个粒子立即就“知道”了。杨超学长将此引申到人生际遇——‘前世有缘’，2012年诺贝尔物理奖，正是这一个宇宙现象的实验证实。”读者通过本文将看到，杨超与蒋南翔这两个“微观粒子”之间存在着怎样的“量子纠缠”。

二、说说杨超的犟

说杨超犟，是指在一些基本方面上天马行空，我行我素。

例如，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子曰：“君子群而不党”，他说：“所以，我在国民党时期拒绝参加童子军，共产党来了以后，拒绝参加少先队、共青团。”

例如，在他的记分册上有很多课的成绩是两分（即不及格），其原因是：他对教学计划里的课程一律自选听课，对于包括金工课、机械制图课、中国革命史课等等在内，他都弃而远之。那么，他腾出时间干什么了呢？到北大旁听德语去了，蹲在宿舍里孜孜不倦地写书去了，他写下了三本书：《新人口论》，《人性通论》，《人性各论》（草稿），如果出版，每本均有近100页。

例如，在1955年反胡风的时候，热九三班全班批判他三天，因为他认为胡风的骨头——“鲁迅说的嘛！”——是最硬的。而且，他还坚持“劳动也可以破坏世界”的观点。他理直气壮地以希特勒强迫劳工为德军修工事为依据。对于批判他的同学，他很不屑，说他们连逻辑学都没有学过。三天批判，最后不了了之。他觉得打了一个平手，颇为得意。

例如，在反右派号角吹响后，动力机械系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开大会批判他三个小时，最后，主持人问他：“你知错了吗？”他说，“你们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我不知道我错在什么地方。”

笔者问杨超，你当时有什么感觉？他说，“我没有听”，“我没有感觉”。

例如，文化大革命来临以后，他带着摘帽“右派分子”这样的“负罪之身”，总应该学乖一点了吧。不，他照样口无遮拦，终于落得大难临头。

又例如，2002年到2005年间，他曾三次在美国生活；期间一些“好心人”劝他凭1957到1969年中的两次遭遇，即可顺利长期在美生活。但他的回答是：1）“现在无政治难可避，我是正常途径出国的”；2）“民族、国家、政府是三个不同的层次，我永远跟民族同命运”。

但是，他也有不羣的时候。

他从小就知道有十八层地狱，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他感觉到可能有违‘天意’的时候，他不羣。

他年少时曾请人给算过命，算命人说他每逢本命年必有劫难，他处在命运之车的车轮边，会有周期性的浮沉起落，落难时候会有贵人相助。他相信其灵验。对于“命中注定”，他不羣。

实际上，当“胳膊拧不过大腿”羣也没用的时候，他不羣。

他有一次被人举报到父亲那里，说你家的小超拿弹弓打路灯，遭父亲一顿暴打，他没有羣到底，不再玩举弓射灯的游戏了。顺便说一句，他妈妈黄静涵从来都舍不得打他。

他从小喜欢生物课，从上海中学毕业的时候，他拿定主意报考上海第一医学院。但是，他拗不过父亲大人，填志愿是被他老人家代劳的——清华大学电机系。杨超并没有为此而拼命抗争，终于违愿赴京与蒋南翔这颗微观粒子“纠缠”上了。

三、杨超“极右”的帽子是怎样戴上的？

1957年5月，中国共产党宣布要开展整风，号召全民参与。种种官方的正式宣传，他并没有留意。他只是觉得，现在可以让人自由说话了。

杨超干的第一件事是在他的宿舍明斋前面张贴了一张抄录的诗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整个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他唯一造访过的老师是居住在二校门东侧的钱伟长，因为父亲杨逢挺和钱伟长早就有私交。杨超回忆与之晤谈的感受是：1）“我不适合学工”；2）教授治校很有道理。

1957年5、6月间，清华园里仅有两个自由论坛，分别在明斋的东南和西南侧。其中西南侧的是杨超参与张罗的，负责出海报、搭台子等等。有一晚上论坛的主题是教授治校，有钱伟长、孟昭英、常迥等等知名教授登坛演讲。杨超也跑上去“推波助澜”，他说：“我100%赞同以上教授们关于教授治校的主张”。“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是改朝换代，因此，对于改朝换代以后由党领导一切，我没有意见。不过，在大学里还是应该实行教授治校。”“清华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但是，那仅仅是在1952年以前的事情，那时候清华大学的国学难道不能够算世界一流？现在呢？不堪回首。”（笔者注：1952年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拥有五个学院（理、工、文、法、航空）。调整后的清华大学只保留工学院。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后来人或许不知道，仅仅一条“支持教授治校”，就是当年足以定罪右派分子的充分理由。

鸣放期间，在二校门旁邮局布告栏，出现了一张署名“弱者”的小字报，内容是揭露在延安整风时期共产党作践知识分子的黑暗。据笔者所知，它被定性为“极其恶毒地攻击共产党”，“弱者”是谁，受到严密追查，动用了一切现代化的侦破手段，好像至今也没有破案。

它立即遭到众多小字报围剿。围剿者气势汹汹，一口咬定“弱者”是反革命分子。学习过逻辑学的犟人杨超“路遇不平”了。他也回应了一张小字报，认为应该让人家说话，现在就这样一口咬定，证据不足。杨超在小字报上堂而皇之地署名，并且写明，我住在明斋多少号房间，欢迎前来一辩。

果然有不少同学找上门来，质问杨超：你凭什么说“弱者”不是反革命分子？杨超客客气气地反问：那么，你凭什么说“弱者”就是反革命分子？直说得登门者一个个都悻悻而去。

犟人杨超不要自以为得计，他终于不得不品尝“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滋味。

既然热九三班难以降服你杨超，我们整个动力机械系在大礼堂与你周旋。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大礼堂挨批判的那一幕，就有了主持人声色俱厉的发问：“你知错了吗？”杨超也就有了一顶结结实实的“极端右派分子”的帽子。

四、第一次贵人相助

大礼堂批判会后的第三天，有一自称为蒋南翔秘书的邵斌来到杨超宿舍，自我介绍以后就吩咐：“到工字厅来一趟，蒋校长要见你”，“你爸爸给蒋校长的信呢？一起带上”。这时候，杨超才想起入学前父亲托付有一封要亲送蒋南翔的亲笔信。他从箱底找出了这封信，同时还有他妈妈的“闺蜜”阮女士写给堂弟阮铭（其时是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的信。两信的内容都是请惠予教诲和关照。

在蒋南翔办公室里，蒋南翔阅信后，不胜唏嘘地说：“都怪我没有把你管教好！”又责怪：“信为什么不早交过来？”杨超的回答是：“我忘了”。也许蒋校长对杨超还训斥了一些什么，但是，现在也统统属于“我忘了”。

杨超事后知道：在这次召见之前，他的‘极右’定性早已被北京市委批准。

蒋南翔获知杨超进了清华，获知他眼下出了纰漏，其消息来源并不是动力机械系，而是杨逢挺的询问电话。而杨父之所以消息灵通是因为就学于清华的杨超上海中学同届校友急匆匆的通风报信。

一般右派分子是允许继续跟班完成后来的学业的，只不过毕业时拿不到文凭。但是，“极右”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一律停止学业，接受实实在在的劳动改造。如果说，带“右派”帽子是带帽人人生轨迹的转折，那么，带“极右”帽子就几乎是此人人生轨迹从生到死的转折。

1958年二月某日，天寒地冻，按照早一天的通知，杨超凌晨4点拎着铺盖卷来到校医院旁边的一字排开的两个高低不同的单杠旁边，周边已经稀稀拉拉地站着20来个着装雷同同样带着行李的同学，他们都是等待发落的“极右”。不久，一辆敞篷卡车开过来了，负责人从司机室下来，拿着名册呼叫：“某某某，门头沟煤矿”。一个人应声上车。这样地一

个个地被叫上车以后，只剩下杨超孤零零地形影相吊。这时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笃信基督教的杨超真的有一点恐惧了：“我好像感到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邵斌先生。他对杨超一挥手：“回去！”“回哪里去？”“回宿舍，继续上课！”哦！原来是一次陪绑！“极右”分子杨超可以与一般右派分子一样继续跟班上课了！负责管他的同班同学后来亲口告诉：让跟班上课这件事是蒋校长签了字的。

啊！果然是命中注定的贵人相助呀！

59届的清华学子们，等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了。对于许多从上海考进清华的毕业生而言，返回上海或其周边地区是他们的夙愿。

“贵人”对于杨超的眷顾还在继续，毕业以后杨超仍然滞留在清华园内等待悄悄的发派。在蒋校长三次疏通以后，他终于在11月得到通知，到上海人事局报到。但是后来又得到一则消息：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有令，右派分子一律不得在本市安排工作。于是，在蒋亲自向许家屯写信后，杨超得以在江苏省人事厅报到。

在离京前一天，他住在清华市区招待所（骑河楼）。他常对人说起他那一夜辗转反侧的心情——五味俱全，永世不忘。

贵人相助！这不是一般的相助，这是让他的人生之旅从“九死”转折到“一生”的相助！每念及此，杨超均十分感恩，而且他相信，他的这种感恩，蒋南翔先生的在天之灵是能够感知的。出自这种不能自己的感恩之情，他不止一次地捐赠叶企孙基金会和蒋南翔奖学金。那当然是在杨超重见天日以后。

五、杨超在毕业后到文革落难前的度日谋生

所谓“贵人”，如今已经远在天边了。杨超必须面对现实：他已经被抛到这个已经改朝换代了的新社会（按照杨超的说法是“新奴隶制社会”）。1959年寒冬，在到南京后的十来天时间内，以江苏省人事厅为起点，杨超完成了“三级跳”：→南京电业局→下关电厂→扬州市水利电力学校。

在南京电业局报到处，人事处处长喝令杨超：“你给我站好！”。这声威风凛凛的喝令，使杨超开始感受到“右派分子”在新社会里是如何地低人一等。

在扬州市水利电力学校，杨超以超人的勤奋和深厚的业务功底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中专带帽”的学校委派的一切教学任务。校领导心里都明白，该校的获奖教材是杨超写的，该校能够获得1961年度江苏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杨超居功至伟。他以自己的非凡业绩赢得尊重，并且在1961年国庆成为扬州市首批“摘帽右派”。1962年，校领导主动提出，让他在一个月内把一学期的课程全部上完，以使它能够以更多、更集中的时间到上海“养病”和干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以有病为由把他的户口迁回了上海。从1962年到1964年，他能够每年有一半时间在上海。1964年以后，该校还主动为杨超调回上海而助一臂之力。由此他体会到，即使当上了“极右”分子，仍然有很多机会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他不无感慨地说：“人和人之间本身就是互相利用嘛，如果自己没有本事，提供不出可交换的筹码，‘贵人相助’也终于会落空！”

在为争取调回上海的日子里，杨超到同济大学 and 上海业余机械学院代课，尽管讲课备受欢迎（而且，还有颇为丰厚的课酬，使他能够每次上课前上西餐馆用餐，在当时一般人眼里，这简直是一种奢侈），但是，回上海就业的愿望总是落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杨超存在抹不去的历史污点——“摘帽右派”。

1962年后，杨超滞留上海的时间越来越多，他因而有更多的机会在生活上照顾他的父母，同时也参与他爸爸的编书、审稿等工作。

打1964年以后，他虽然成为了无业青年，而且仍然顶着摘帽右派的帽子，但是，他享受着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天伦之乐，还能够参与杨逢挺等“物理三巨头”领衔的《辞海·物理卷》的编纂工作，他是这个团队里的三个青年助手之一，他贡献过100余条初稿，其中有10多条被采纳。他觉得在1964—66年间，自己接受了研究生式的培养，很荣幸地有机会“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其时他的心情可以用《黄河大合唱》里的一段歌词来描述：“我们看见了河岸，我们登上了河岸。心啊，安一安，气啊，喘一喘。”。

1966年文革巨浪扑来，改变了杨超的家庭，击碎了他的梦想。

1968年，杨超想，成家立业，业立不了，先成家吧，就与他的第一任夫人郁氏在交往半年以后匆匆完婚。夫人是上海某特大资本家的女儿。

六、杨超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是怎样戴上的？

文革将临前，他看了揭露纳粹排犹的著名德国故事电影《马门教授》，很受震动。很相信宿命的杨超说：“我冥冥中有一个不详预感，像1957年那样的文字狱又要来了。”“该来的总要来的，躲也躲不了。”

文革来临以后，他爸爸立即被揪了出来，家被炒，他爸爸被强迫劳改，收编在一个有四十几个人的劳改队。被揪出来的原因之一是重用身为“五类分子”的儿子杨超（杨超认为是唯一原因）。

杨逢挺先生为照顾“上师院”的同事，曾经把几本编物理教材的任务分派给这些同事，后来收回成命重新委托给儿子是事出有因的。杨先生训斥：“你们怎么竟然会出这么多的错！被我儿子挑出来。你们想想，他还不是学物理的！”

杨超感到祸由他起，主动向劳改队申请陪同参加劳动改造。终于被应允。因此，1966年8—12月，杨超天天早出晚归，真正地与他爸爸实行“三同”。

1969年8月6日夜，公安局来家里把杨超拷走了。杨超的命运发生大逆转：他成为上海市由林彪骨干王维国亲自查办的两大反革命大案的罪犯，被羁押在上海徐汇区看守所，罪名是：美蒋派遣特务。（另一反革命大案的罪犯是彭加木。罪名是：美蒋潜伏特务）。

杨超1961年回沪后，结识了一位女友，她父亲生前是蒋介石的私人飞机驾驶员，后撞山早逝。她的母亲有一个朋友圈，定期搞联谊活动。活动内容不外闲聊、吃饭、郊游、拍照等等。圈内成员，不少是原香港中华航空公司的故旧。杨超每每陪同前往，常常情不自禁地“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一番。文化大革命一来，联谊会的成员统统成为审查对象，专案

组让对象们比对照片，就轻而易举地把杨超这个陌生人指认了出来。“怎么回回都有他”？专案组成功地将杨超这个美蒋派遣特务发掘出来，靠的不是逼供信，而是对审查对象的“启发和诱导”，以及他们自身高度的“敌情观念”。

某年月日，专案组通知杨超将被公判，问及有什么想法，杨超回答：“如果公判我死罪，明年6月上海会下雪。”专案组的傻瓜只知道笔录，到第二天才悟出这是借关汉卿《窦娥冤》鸣冤叫屈，把他叫去恶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后来，公判大会于1970年12月在上海市襄阳南路小学（永嘉路上）召开了。大会决定将杨超带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交革命群众监督。

所谓美蒋特务的罪名终于不再成立了，杨超蹲看守所的日子随之结束。

那么，这个现行反革命帽子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看守所期间，主案方意外获取了杨超反中央文革的确凿证据。

1967年7月，杨超在翻译了一些桥牌书以后，兴趣转移到打桥牌上，他张罗起一个并不挂名的桥牌俱乐部，有上百人的规模。它以上海市体委为活动中心，把棋牌界的大腕人物如胡荣华、徐天利等等都吸引进来。兴致高的时候，桥牌从天亮打到天黑。杨超每天都会与10来个牌友周旋。

在30年代就蜚声影坛的上官云珠是杨超的干妈，她姐姐与杨超的三姨是终身相伴、无话不说的知己。当年江青（蓝苹）的轶事就这样从桥牌桌散布出去了。反对中央文革就成为了杨超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四人帮覆亡前根本无法洗刷的罪名。

因此，被放回社会的杨超仍然是上海市的“五类分子”——现行反革命。他在田林居委会管制下变换地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与“同类人”一起进行政治学习，每月领到24—26元生活费。

在各种体力劳动中，杨超最乐意的是每周三次的早出晚归踩三轮车，一早将某街道工厂生产的1000公斤圆规半成品拖到苏州河北边的上海普发仪器厂电镀，并且把成品拉回来。他于是有了作息自由，能够独享在树荫下看书的快乐。他忙里偷闲读书的行为终于被好事者举报了。杨超太另类了。有人觉得这是不好好接受改造；也有人相信他是“神经病”：一个穷途末路的反革命，还要痴心念什么书，不是一个十足的“神经病”是什么？

1975年批邓，在一次“五类分子”政治学习会上，人人都表了态，最简单的表态仅是短短五个字：“打倒邓小平！”。杨超却始终默不作声，在主持人逼问下，他回答：“我没有资格说话，我们五类分子怎么可以打倒国家领导人呢？”这被定性为“反对批邓”，罪上加罪。

居委会负责管制他的人曾多次以“神经病”为盾牌掩护过他。杨超多年后登门向她道谢。她说：“不用谢。我当年的确觉得你是‘神经病’。”（笔者注：“神经病”是上海人对于精神病人的习惯叫法。）

在这个“新奴隶制社会”里，他逐渐修炼出了自己的处世之道：人还要有一点玩世不恭，要有51%的阿Q精神等等。

七、第二次贵人相助

故事说到这里，读者很容易想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杨超立即就能够一洗“反对中央文革”的前罪，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了。但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现行反革命帽子仍然一直箍在杨超头上。

1978年，已失去老伴的杨妈妈黄女士为争取他的平反而到处求助。信访无果后，她向当时在上海主政的彭冲、林乎加投书，也同样没有回音。

她灵机一动，抱侥幸心理往北京蒋南翔写了一封求情信。

一周后，蒋南翔亲自来到上海，关心起这个命中有不解之缘的微观粒子——杨超——来了。

蒋南翔派小车三次接杨妈妈到静安宾馆与之面晤后，单独召见杨超。

杨超鞠躬问候：“你受苦了”，蒋答：“劫数难逃”。蒋说：“我和你妈妈商量好了，今后由我来管教你，你跟我回清华去，做我的助手。”杨超出乎意料地说：“我觉得不合适。”“为什么？”他指着与蒋南翔一起来上海的海军司令员叶飞面前的一个圆形烟灰缸说：“比方这个烟灰缸，要是叶老硬说它是方的，你叫我这个助手怎么说？”。蒋南翔拍桌吼道：“秉性难改！”

息怒后，蒋南翔表示，将与华东师范大学刘佛年校长联系，让华师大来安置和管教你这个驯不服的杨超。

一周以后徐汇区公安分局把杨超叫去，说他已经“修成正果”了。公安局的人感慨地对杨超说：“想不到你在中央还有人！”

1978年11月30日徐汇区公安分局《关于杨超问题的复查结论》认定：“杨超同志‘恶毒攻击’属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撤销1970年8月30日“戴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的决定，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杨超‘恶毒攻击’的对象是江青。现在，四人帮倒台了。为什么当局还要揪着不放呢？其中的蹊跷在于杨超‘恶毒攻击’的还有另外的对象——伟大领袖毛泽东。他说过：“毛泽东是混世魔王下凡。”

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杨超实事求是地说，“我的确说过，在交代材料中也承认过，所谓的‘恶毒攻击’是确有其事的”。

贵人蒋南翔和官高一级的叶飞硬是逼着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分局裁定，杨超同志根本就没有说过这样‘恶毒攻击’的话。

笔者由此感受到，在一切极权社会里，“事实”是可以打扮的：权势者说是事实，不是也是；权势者说不是事实，是也不是。

问及怎样历史地评价教育家蒋南翔，杨超说：“我历来认为：党性加人性等于常数”。“蒋南翔（至少在我杨超身上）表现出更多的是他的人性。”

笔者赞赏杨超关于“党性加人性等于常数”的论断。

笔者指出，蒋南翔作为中国共产党派驻清华大学的总代表，清华反右派运动的统帅，在广大的右派分子面前，鲜有人性的流露，在袁永熙、钱伟长、黄万里、徐璋本、冯国将、孙宝琮、党治国等等老师和学生身上表现出的是他一贯的党性。什么是党性？党性就是要坚持党的信仰，执行上级党的指示，按照上级党的战略部署亦步亦趋，为官者的党性就是千万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笔者认为，在清华大学，蒋南翔堪称是‘党性第一，人性第二’的典范。

八、杨超老当益壮的劫后余生

可以将杨超的一生划分为前半生和后半生，而1978年是其分界。

1）杨超的前半生

笔者认为，就前半生而言，杨超的辉煌在于与专制政权强加的噩运抗争，树立了一个站着做人的榜样。除此以外，值得记述的主要业绩在于给世人留下了一套书。杨洋说：“杨逢挺编写了大量教材，……名气最大的当数杨逢挺参与主编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该丛书共有17册，于1964年首次出版，“文革”后第一次重印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效应，一时洛阳纸贵，后多次重印，先后发行了435万套共7395万本，已成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2012年上海广播电视台摄制了纪录片《上海故事》，其中有一辑专题《一代人，一套书》，一代人指的是77—79级‘老三届’，一套书指的就是这套丛书。”

在上海市松江中学2004年《校友通讯》里，刊载了1936届学生顾传的《缅怀母校百年大庆》，里面也说到：“物理教师杨逢挺先生，1963年曾参加上海科技出版社《数理化自学丛书》的编写。……这一套丛书嘉惠学子，真是功德无量。”的确，对于终于遇到升学良机的一代学子而言，它不啻是雪中送炭。

杨逢挺在出书、编书方面的许多成就其实都是杨氏父子的共同成果。尤其是这一套丛书，是当时正年富力强的杨超作为助理主编而全面参与并总其成的。

2）杨超的后半生

本来，杨超的后半生应该以他在蒋南翔的引荐下到华师大继续他的教育事业为起点。但是，命途多舛，由于夫人郁氏家族“夹着皮包回来了”，他进入了商界，成为了香港新鸿基集团（中国）上海办事处负责人。1983年他以新鸿基首席顾问的身份主持了上海多国仪器仪表展览会，这是这种展览会在中国的首次成功举办。会展期间，杨超遇到了两位热九三同班同学，对方颇感意外：“我们早听说你已死了”。他们哪里能想到，杨超不仅活着，而且还颇为风光。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杨超容不得郁氏家族对于新鸿基上海办事处的干预而被挤兑出来。他的第一次婚姻因此也就在1985年（他的本命年）画上了句号。杨超净身出户了。真正的后半生开始了。

这段在新鸿基从商的不凡经历也为他后来的“崛起”积累了经商的经验，储备了人脉资源。

他必须面对经济的窘困，业务的荒疏，现代科技知识的落伍。

但是，他没有失落感。他深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他认为一切现代科技知识的都是物理学管着的，而在这方面他不落人后。

1996年，杨超在上海教堂做礼拜的时候，邂逅了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原上中同学，他向杨超介绍了美国在机械润滑领域里领先的新技术，希望杨超能够在国内予以推广。两人一拍即合。杨超于是轻车熟路地邀请美国APS (Advanced Products & Service) 公司来中国石化研究院做技术交流，活动圆满成功。从1998年起，杨超担任该公司在华的高级顾问。

这标志着杨超进入了该技术领域。

此后16年来，杨超撰写了许多文章介绍“润滑优化工程”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例如：《颠覆旧思维，实现真润滑》，《风电齿轮箱的润滑》，《风电设备运行和维护的盲点》等等，风尘仆仆在国内外奔走，参与技术认证和推广。

近年来，中国在“润滑优化工程”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株洲车辆厂、三峡机组大电机等等应用现场，都有“润滑优化工程”成功的范例。杨超至少起了“助推器”的作用。

在全球公开发行的《现代制造及现代驱动杂志 (MM)》2014年第17期上以他为主题的封面及另三个版面上，再次报道了他16年来在润滑优化工程方面的工作（2009年曾报道过）。

杨洋说：“从90年代开始，杨超受到以“恢复沙漠土地原来生态”为核心的美国沙漠治理技术的启发，开始关注我国土地沙化的治理工程。

他受邀担任了“中华原生态治沙工程联合会”首席顾问，与“中科院兰州寒旱所”、“上海侨商会”等多个单位合作，在十几年时间里奔波于美国技术与产品的引进，治沙资金筹集，在甘肃敦煌、武威，内蒙阿拉善右旗、乌海等多个沙化灾害地的实地考察和技术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08年9月杨超学长受邀参加“中国首届沙产业高峰论坛”，并荣获“技术先进奖”。

笔者概括他后半生迄今为止的两大事业：一是“润滑优化”；二是“治沙”。在杨超看来，他之所以从“润滑优化”进入“治沙”的根本原因是：两者均属于精细化工。

有人问杨超：你这一辈子最感谢哪个人？他回答：“如果说要感谢一个人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我感谢上帝！”

九、杨超传承了哪些清华精神？

本文认定清华精神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笔者按此试答如下：

是什么使杨超忘记了呈交父亲给蒋校长的亲笔信？如果说当年杨超就已经认识到蒋南翔就是推行党化教育的大人物，因而避而远之。这并不是事实。但是，清华精神不屑于任何趋炎附势。杨超认为，我既然是“堂堂正正考进清华的”，那么，就无须任何人的特殊提携和关照。

从父辈的亲疏关系看，蒋南翔比钱伟长更亲。但是，在清华园里杨超登门拜访的人，不是蒋校长，而是钱教授。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从后者那里，更能够感受到清华精神。在1957年身陷绝境的时候，杨超丝毫也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援手的念想。他对父母一声不吭。不向任何人乞怜求助，表现出‘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

杨超坚持选课自由。他为什么不听必修课《中国革命史》？他说：“明明抗日战争是蒋介石领导下打胜的，却要说是共产党的功绩，这样的课听它干什么？”为什么不听机械制图课？他说：“机械制图太辛苦了，迟早会被比较节省人力的现代化制图取代。”

蒋南翔以不容商量的口吻通知杨超回清华做他的助手。杨超敢于顶撞。是什么使其时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的杨超敢于批这位颇为春风得意的蒋校长的逆鳞？正是清华精神：一个堂堂清华学子，岂能安心做一个在工字厅里诺诺随从？（笔者注：工字厅是中式传统的三进院落院子，现为校领导的办公地。）

在“新社会”里，杨超敢于说出“毛泽东是混世魔王下凡”这样的话，就像在欧洲中世纪末期的哥白尼说地球围着太阳转一样，需要有超出同时代人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杨超的这种洞察力和勇气从哪里来？来自清华精神。

十、结束语

“极右”和现行反革命两项帽子是通过反右派和文革两大运动强加给杨超的。现在，像从前那样的运动已经不再能够搞得起来了。但是，民主宪政还远，专制制度还在，并且被肯定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不搞运动不等于不搞专制。所以，把一切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划为“敌人”而加以蹂躏和摧残的危险并没有远离我们而去。

（作者简介：高越农，1936年出生。1954年就读清华大学电机系 / 自动控制系。1959年毕业）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 【追根溯源】

### 民粹主义思想与文化大革命运动

• 刘建国 •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革爆发有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中，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原因之一。

一、夸大阶级斗争，把批判斗争绝对化，不断在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等领域掀起大批判

民粹主义对旧制度、官僚贵族和反动派嫉恶如仇，对人民则充满同情和献身精神。这是民粹主义及其代表人物令人敬佩之处。但是，民粹主义者对待同一战壕的战友、革命队伍内的同志与可团结联合的朋友中的持不同意见者，却十分偏执而毫无宽容性。“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这是民粹主义激进派的一段名言，也是他们所遵循的一个思想原则。在他们的思想里是没有中间地带、中间势力的，一切非我皆敌，非黑即白。这一思想曾影响到俄国布尔什维克队伍，影响到斯大林对党内和社会矛盾斗争的处理，影响到对待中间势力的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和中共党内的一部分人。

俄国民粹主义奉行批判哲学，具有把斗争绝对化的特征。民粹主义激进派公开宣称，他们只知道“破坏的科学”，“反对和平无争的学问”。这就意味着要进行无休止的破坏和斗争。就连民粹主义稳健派的代表拉甫罗夫也认为，批判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说：“即使由思维活动，由对现存事物的批判所引起的斗争造成了可悲的情景，采用了社会革命或思想革命的武器，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和秩序，也只有通过暂时的骚动和混乱，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取得对大多数人未来安定和秩序的更好保证。这是屡见不鲜的事情。”这里应当区分两种情况，是对待敌人还是对待朋友，是乱敌人还是乱自己？不区分敌我、不区分敌友，这样笼统而言“破坏秩序和安定”是错误的。无疑，对于沙皇专制统治或资本主义的旧社会，这样通过批判、斗争，发动革命，使社会出现骚动和混乱，这是乱了敌人，有利于夺取政权，原是可以的；而在人民已经获得政权的情况下，若仍这样无休止地斗争，则是乱了自己，乱了人民的国家，这是不允许的。民粹派和受民粹主义影响的人不区分这两种情况，笼而统之地讲“破坏”，讲“批判斗争”，把斗争绝对化，这种理论在实践中造成了极大危害。

斯大林曾受到民粹主义这种偏执教条的影响，把无休止的斗争移植到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连续发动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和思想文化斗争，把党和国家搞得不得安宁，还美其名曰“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这种“理论”也严重影响到我们党内。

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后，批判斗争一波连着一波：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胡适、批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批小说《刘志丹》、批人道主义、批人性论、批“中间人物论”、批经济学家孙冶方、批“合二而一”哲学、批“三家村”。

在文革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要求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曾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紧接着，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又呼吁“要提高警惕，要斗争，不能存有和平幻想。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斗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丧失这种警惕性，不团结起来斗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林彪倒台后，又借“批林批孔”影射周恩来，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连串运动，把党和国家搞乱了套，将国民经济引向了崩溃的边缘。

这种不断夸大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大搞批判斗争的做法，和民粹主义那种教条主义的偏执和将批判斗争绝对化有许多相似之处。

巴枯宁说：“破坏的激情同时也就是创造的激情！”在巴枯宁这句话里，“同时”二字实际上变成了“等同”。这意味着在民粹主义这里，破坏和创造是不可分割的，甚至破坏就是创造。文革深刻的哲学错误正在于此。

## 二、“崇尚人民”，信奉群众运动，把民众和群众运动理想化、绝对化

各种各样的民粹派，在信仰和崇尚人民这一点上是最大的共性。他们认为，“人民的生活本身总是合理的”，“人民是真理的支柱”，“在人民中保存着真正生活的秘密”，“潜藏着社会真理”。由信仰和相信人民，发展到信奉民众运动，这是民粹主义的逻辑。因此，革命民粹主义者在19世纪70年代上半期曾发起了一个颇具声势的“到民间去”运动。他们穿着农民的衣服、留着农民的发式，到民间宣传群众、动员群众，试图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普遍发起暴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与目标。

在这方面，毛泽东受到民粹主义的思想影响由来已久。早在1927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对群众运动有绝对肯定的倾向。在讲到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时曾说：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毛泽东还提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众所周知，在关键的理论上失之毫厘，在重大政策实践中就会差之千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文革中是重要的指导性文件之一，这些语录是每会必读的“最高指示”，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其影响之深，空前绝后。毛泽东早期著作透露出来的某些民粹主义思想色彩，对文革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

在文革初期，他特别把广大的青年学生看作是突击力量，因而给予红卫兵运动热情的支持。毛泽东在看到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后，认为红卫兵的言行完全符合自己“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愿望。因此，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对他们“造反有理”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还先后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总计达1100万人次，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更加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毛泽东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1、2、3、4、5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么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这么一冲，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美国的莫里斯·迈斯纳教授则认为：“红卫兵不过是被选择来实现毛所颁布的各种‘指示’和‘教导’的工具。”

文革虽然规模巨大，但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看一场运动是否为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主要的不是看有多少人参加，而是看他们为什么参加以及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参加的。文革时期，中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当时，全国人民的根本意愿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不是天下大乱，经济萧条，文化凋零，民不聊生。文革之所以有这么多群众被卷进去，并最终走上完全和群众意愿相反的道路，有复杂的原因。这既有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惯性推动力，也有群众对毛泽东的盲目响应；同时有运动中巨大的社会压力，谁反对文革，谁就会被批判斗争，甚至坐牢丧命。

其实，在文革以前，我们已经把群众运动当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就曾受到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惩罚。但领导人并没有从这里吸取教

训，到“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经济形势稍稍有所好转，又进一步恶性发展，上演了一场更惨烈的悲剧。

### 三、轻视知识、知识分子，反对文化崇拜，造成反智主义盛行

俄国民粹主义在文化观上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把文化视作“贵族”的“趣味”。其根源，一方面，在民粹派看来，文化本身是靠剥削人民获得的，这样，掌握文化就似乎同剥削、同罪孽联系到了一块儿，仿佛文化本身也沾染上了剥削和罪孽的味道。因此，民粹主义思想经常对文化抱以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在任何条件下都会起来反对文化崇拜”。另一方面，也同他们对待文化的极端功利主义态度有关。民粹主义对待文化的行动准则就是“有益”，它仅仅出于实用目的来判断文化的标准，因此，民粹派“主要对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感兴趣”。19世纪60年代著名的虚无主义者皮萨列夫就“崇尚务实”，“只承认自然科学，鄙视人文科学”。

民粹派反对文化崇拜的重要表现，是瞧不起甚至鄙视传统的大学，以“不信任的目光”，看待大学教授。他们鄙视“抽象理论”，只看重实践经验，因此，克鲁泡特金主张“关闭一切大学”，认为“我们需要”的只是“医院、工厂”“生产作坊和工人学校”。巴枯宁也宣称，实际斗争就是“科学”，他号召青年“抛弃这些大学”，“到民间去吧！你们的战场，你们的生活和你们的科学就在那里”。

无论自觉不自觉，在文革当中以及此前，在对待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上，就曾出现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反对文化崇拜的现象。毛泽东曾多次讲过，“书越读越蠢，越是知识分子越容易产生修正主义。”他还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论断，认为“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列入“黑五类”，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变为“臭老九”，和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一起，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与此同时，又片面强调实践经验，以及开门办学，培养工农兵大学生。1966年4月14日，毛泽东在《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中指出：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4比6。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都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

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呈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1968年他又一次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正如钱理群在“城流乡动2007年文化研究学会年会”上的发言中所指出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指导思想上是有着浓厚的反智主义的倾向的……而反智主义恰恰也是民粹主义的一个要害。

#### 四、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情绪

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并不一概地批判、否定资本主义，马克思曾肯定资本主义创造了无可比拟的巨大生产力，主张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成果，在这一文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则一概否定资本主义，完全把资本主义视为祸害，其典型特征就是对资产阶级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的恐惧，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主要倾向是批判，是否定。

1949年后，我国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共提前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主张越过新民主主义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改变生产关系，造成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看作是总路线的实质；只用短短三四年时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一统天下。

早在1953年6月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确定时，毛泽东就提出了让资本主义绝种的观点。1955年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再次提出“让资本主义绝种”，认为“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割资本主义尾巴，“兴无灭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直至文革中更极“左”地宣称“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除了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要求“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外，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另一纲领性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又明文规定：文革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两个纲领性文件指导下，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学术权威展开无情的批判，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依据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与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但是，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使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的我国社会不能实行那种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形式，而应当允许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并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多种所有制并存。事实上，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除了对立关系，还有继承关系：“在生产关系以及保护生产关系的国家政权方面，是对立的关系；在生产力方面，是继承的关系。”“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提法，割资本主义尾巴、“让资本主义绝种”的做法，反映了中共主要领导人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没有分清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界限，甚至在指导思想上有民粹主义的思想色彩。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在一定阶段有其必要性和先进性，害怕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危害社会主义制度，因而极端厌恶、仇视资本主义，只想早点让资本主义消亡直至绝种。其结果是导致在生产力相当落后的情况下急于改变生产关系，追求“一大二公”，造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背离，受到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严厉惩罚，使我国经济几近崩溃，人民生活极端贫穷困乏，教训十分深刻。

□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11期

~~~~~  
【劫后反思】

红卫兵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希望？

• 丁晓宇 •

〔作者前言：本人也算是半个红卫兵，对红卫兵的批判，也是对自身的批判。明明知道是精卫填海，却还是乐此不疲；纵然是以卵击石，总觉得也比被踩成泥泞来得精彩。前三十年活在谎言中，后三十年当然要与谎言较真。不然的话，我的子孙后代还要活在谎言中，我有什么面目去见我的祖先？〕

今天的中国，各个领域，各行各业，真正掌握话事权的人几乎都是50岁以上岁数的人，大到国家政局，小到民间私企，甚或一个家庭，真正掌握决策权的大多属于这个岁数层的人，而这个岁数层的人恰恰就是三十前的红卫兵红小兵。当年的红卫兵司令，而今已成党国栋梁；当年的红小兵小将，而今至少也当了家长；也就是说，整个中国从上到下几乎都是红卫兵出身的人掌控。显然，红卫兵已经全面接掌中国，今日之中国才真正进入红卫兵时代。

红卫兵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希望呢？这话题还真不好说，不妨先回过头来看看红卫兵的本性，或许会有些少启迪。这要从红卫兵的成长过程说起。

◇ 红卫兵的成长过程

人的品性基本上取决于他成长过程的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成长环境，二是思想教育。

先说红卫兵的成长环境。

红卫兵真正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这一代人的整个成长期，中国正陷入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也就是无休止的整人斗人杀人，搅得整个中国腥风血雨。从抗美援朝，到镇压反革命，到大跃进，到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无不是整人斗人杀人。红卫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小见惯了斗人杀人，从观摩斗人杀人到参与斗人杀人，从零散的斗人杀人到大规模的斗人杀人，残暴与残忍贯穿了红卫兵从童年到成人的整个成长过程。

再说红卫兵接受的思想教育。

红卫兵的整个成长过程，正是中国陷入人类历史最反智的时代，反宗教，反传统，反人性，反人权，反理性，反文明，反文化，几乎是无所不反，除了毛思想。红卫兵从幼儿园起就被强制洗脑灌脑，被灌入头脑里的唯一的思想就是毛思想。红卫兵是真正用毛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人，毛思想决定了红卫兵的基本思维，决定了红卫兵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也基本上决定了红卫兵的本性。

◇ 红卫兵的基本思想

红卫兵是真正用毛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人，毛思想的核心有两个基本点：一是阶级斗争，二是唯物主义。毛思想的这两个基本点决定了红卫兵的基本思想，明白了这两个基本点，就不难明白红卫兵的本性。

阶级斗争思想。

阶级斗争思想的核心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暴力夺取政权，用暴力巩固政权。阶级斗争理论把人类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鼓动阶级仇恨，然后鼓动一个阶级起来消灭另一个阶级，从而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再把异己分子打成阶级敌人加以镇压，从而巩固政权。

在毛思想的整个体系里，在毛一生的社会实践中，人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透了就是权力斗争的工具，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为了权力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从打土豪分田地，到镇压反革命，到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到今天的维稳阵势，都是这种思想在主导。

唯物主义思想。

唯物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无神论。唯物主义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哲学基础，凡是鼓吹阶级斗争思想的，也必然鼓吹唯物主义。唯物主义无神论否定人的生命是神创造的，从而否定了人的生命的神圣性，否定了人的生命的尊严，进而否定了天赋人权，也就是否定了人的生命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唯物主义无神论认为人类是猴子变来的，所以动物世界里的生存原则“弱肉强食”一样可以适用于人类社会。这就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哲学逻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把动物世界里“弱肉强食”的生存原则推行到现代人类社会。

这就是红卫兵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决定了红卫兵的本性，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残忍，二是贪婪。阶级斗争思想造就了红卫兵的残忍，唯物主义思想造就了红卫兵的贪婪。文化大革命是红卫兵残忍本性的大暴发，而今的贪污腐败则是红卫兵贪婪本性的大暴发。

阶级斗争造就出红卫兵的残忍。

阶级斗争理论的荒谬性及其危害性，历史已经验证。凡是阶级斗争思潮泛滥的地方，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人类用无数的生命为代价，从反面证明了阶级斗争理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公害。然而，阶级斗争思想对人类造成的最大的危害，不是在于它造成的人道灾难，而是在于它对人性的毒害。在阶级斗争思想的荼毒下，人性变残暴变残忍了，红卫兵就是活生生的样本。

阶级斗争对人性的毒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鼓动仇恨。阶级斗争理论把人类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鼓动阶级仇恨，鼓动报仇雪恨。三十年前的红卫兵，在阶级斗争思想的荼毒下，恨地主，恨右派，恨老师，恨祖宗，恨苏修，恨美帝，恨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几乎无所不恨。仇恨毒化人心，也就是毒化人性，人性变残暴残忍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是宣扬暴力。阶级斗争理论的核心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暴力夺取政权，用暴力维护政权。阶级斗争理论，鼓吹暴力，美化暴力，歌颂暴力，暴力变成革命的象征，残暴残忍变成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不残暴不残忍，就是政治立场不坚定。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政治立场不坚定，无异于是自己杜死自己的前路，所以红卫兵比残暴比残忍，越残暴越残忍，也就越自豪。

三是鼓吹强权政治。阶级斗争鼓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抓住了枪杆子，谁就是大王。这种强权政治演化到民间，就变成了流氓政治，谁的拳头大，谁就是大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质上就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翻版，这就是一种强盗逻辑，把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的生存原则推行到人类社会。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社会，必然变成一个不讲理的社会，高兴与你讲点道理，不高兴就一枪毙了你。在这种不讲道理的社会里，心狠手辣成为一种致胜的手段，残暴残忍也就成为一种生存之道，慢慢就会变成一种生存意识了。

所谓的阶级斗争，无非就是整人斗人杀人，红卫兵自小见惯了整人斗人杀人，加上学校教育夜以继日的洗脑灌脑，再加上传播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鼓吹，阶级斗争思想深化到了红卫兵的骨髓里，变成一种性格了。残暴残忍便转化为一种政治意识，进而转化为内在的思维意识，听上一辈人说，当年打土豪分田地，很多的农民同情地主。到了红卫兵这一代，见到斗地主，斗得越惨越激奋；去参加公审大会，听说要枪毙人，就象去参加演唱会一样兴高采烈；看战争片，大炮轰来轰去，见到血肉横飞，无不欢呼喝彩。这就是红卫兵的本性：以斗人为乐，以杀人为荣。

唯物主义造就出红卫兵的贪婪。

唯物主义无神论是近代人类走向堕落的最深层的思想根源，凡是无神论思想泛滥的地方，都陷入全面的腐败堕落，近代历史与社会现实越来越显现出无神论的危害性。唯物主义无神论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性，涉及到信仰的本质问题，要阐明这个问题不容易，这里就谈谈无神论对人类最显现的一个危害：导致人性变贪婪。

唯物主义无神论否定灵魂的存在，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生，死后什么都没有了。这种生命观衍生出两层的生存意识：一是及时行乐，二是不怕报应。

及时行乐带来穷奢极欲。

唯物主义无神论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生，所以人生要及时行乐。这种人生观只在乎物欲的享受，看着别人享受，心里就难受，唯有拼命赚钱，赚到钱就放纵情欲享受。这种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变穷了，就觉得生不如死；变富了，就穷奢极欲。人的欲望是一个无底洞，越是追求物欲享受，欲望的黑洞就越深，人心就越是贪婪。人世间日日在重复演绎这样的故事，欲壑难填，这里就不用多说了。

不怕报应变成穷凶极恶。

人类社会靠道德与法律遏止人的恶欲，道德是遏止人作恶的第一道防线，法律是遏止人作恶的第二道防线。

道德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信念，人类用这些信念约束自己，也用这些信念评判别人。所有的道德信念都归结于一个根本的信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根本的信念最终的逻辑依归就是对神的信仰，只有相信神的存在，才有可能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唯物主义无神论否定了神的存在，也就是否定了这个道德的根本信念。道德的根基被摧毁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道德沦丧，世道败坏。无神论者不敢作恶，并不是敬畏道德，而是畏惧法律，一旦对法律的恐惧解除了，情欲往往就会转化为恶欲暴发出来，而一旦恶欲暴发出来，就敢把坏事做尽做绝。

在两种情况下，无神论者最容易暴发出恶欲：一种是陷入穷困潦倒，觉得生不如死，对法律的恐惧就消失了；一种是大权在握，法律管不了他了，对法律的恐惧也消失了。前者往往变成强盗，后者往往变成贪官，他们敢把坏事做尽做绝，变得穷凶极恶了。

红卫兵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三十年前靠革命理想约束贪婪的情欲，后来革命理想破灭了，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约束贪婪的情欲了，于是就放纵情欲享受。放纵情欲，也就是放纵贪婪的心，对财富的贪婪，对权力的贪婪，最终都归结于对肉欲的贪婪。

红卫兵是中华民族历史最没有修养的一代人。

说这话，心里就隐隐作痛，文章开头就说了，本人也是半个红卫兵。说自己是半个红卫兵，有两层意思：一是文革时年纪小，只够格当红小兵，当红小兵队长，所以级别上可以算是半个红卫兵；二是自我分裂，前半生是红卫兵，后半生痛批红卫兵，刮骨清毒，把被灌入的邪恶的思想清除，所以是半个红卫兵。

红卫兵的整个成长过程都是处于反智的时代，反人类，反文明，反文化，几乎无所不反。原来应该是求知识求修养的最好的年花，被浪费在反智的政治运动中，当我们醒悟过来时，最好的年花已经失去，无论多么努力，还是无法弥补成长期留下的缺陷，知识的缺陷，素养的缺陷，信仰的缺陷。人的素养修练，有的过了成长期就永远弥补不上了。所以说，红卫兵变成了中华民族最没有修养的一代人，概括起来就是：缺失宗教信仰，缺失传统修养，缺失人文素养。

红卫兵缺失宗教信仰。

红卫兵自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批判宗教信仰，反对宗教信仰，而且仇视宗教信仰，文化大革命掀起全面的反宗教运动，大肆破坏教堂寺庙，残酷地迫害宗教徒。

宗教信仰的宗旨是倡导爱，是为培养人的爱的情怀。宗教信仰劝人从善，不要从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理念就是人类道德信念的逻辑依据。基督教倡导人人生而平等，更成为现代文明的最基本的精神。世界上人格伟大的人，往往都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宗教信仰对人格修养的重要性。红卫兵的残忍与贪婪，最深层的根源就是因为缺失宗教信仰。

红卫兵缺失传统修养。

中国人普遍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中国人的人格修养主要是靠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由官方主导的孔孟之道，另一方面是民间传承的习俗。孔孟之道是官方为士大夫阶层选定的必修课，传统习俗是民间自发传承的礼数，中国人就是靠这种传统文化修身养性。

孔孟之道被渗入太多的封建政治理念而带有太多的糟粕，但作为人格与道德的修练还是有其精华，至少对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人格修练有正面的意义，所以历史上的士大夫阶层曾出现过不少的正人君子，出现过许多人格高贵的人。

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拜天地，拜祖宗，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宗教信仰。中国人就是靠这种朴素的信仰传承生活信念，传承道德信念。这种朴素的信仰可以从中国人的婚礼上看到。结婚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中国人的婚礼，一拜天地，二拜祖宗，三拜高堂，然后才是夫妻对拜。天地是至高无上的，所以要敬畏天地；天地之下是祖宗，所以要敬拜祖宗；祖宗之后是高堂，所以要谨守孝道。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培养出中国人敬天悯人的情怀，对天地的敬畏，对弱者的怜悯，让人性走向圆满。

红卫兵把孔孟之道作为封建思想批判，把传统习俗当作封建迷信批判，不仅没有了敬天悯人的情怀，甚至连传统的孝道都衰败了。

红卫兵缺失人文素养。

红卫兵求知识的最好的年华，被浪费在阶级斗争与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中，学校被毛思想垄断，读语录，唱红歌，跳忠字舞，反文化，反文明，反人性，反理性，反宗教，反传统，几乎无所不反，人类创造出来的人文艺术，都变成了封建修的毒品，统统要消灭。所以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琴棋书画没有几样会，就连最起码的唱歌也是个五音不全了。

我们不妨看看历史上的士大夫，他们必须经科举考取功名，所以都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不敢说封建士大夫的人格修养有多么高尚，至少可以说他们的文化修养出类拔萃，正是靠那些出类拔萃的士大夫承前启后，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化。

我们再看看民国时代的精英分子，传统文化赋予他们谦恭的品格，西方文化赋予他们平等的精神，他们以卓越的学识与高贵的品格，让世人敬佩，就连他们个人的生活情趣，也让后人人为之倾倒。我们今天读到他们的传记，依然感慨万千，那个时代的精英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红卫兵身上有什么？无论是人品，还是文品，有哪一个人可以与民国时代的精英比肩？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比，比堕落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比修养则望尘莫及矣。

这样的红卫兵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希望？

□ 原载《思想娱乐文摘》

~~~~~

【一家之言】

我的文革反思

• 朱永嘉 •

〔作者按：这是我在《巳申春秋》出版前写的一篇自白，也是我对自己八年前口述的回顾，最近包括乌有日刊在内的一些网站都有转载。原标题为《口述者八年以后的自白》，现在这个标题是网上转载时改的，与我的原意并不完全一致，因为是转载，现在只能沿用。这本口述从上海市委写作班的视角，写了文革初期两件事，一是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二是讲了自己亲历的上海一月夺权的过程。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发生在1965年，那年是蛇年，一月夺权后，我回归专题写作组，它解散于1968年，那年是猴年，依照干支纪年，故本书取名《巳申春秋》。所记内容前后四年，主要是文革酝酿发动时期的二个历史事件，还没有叙述到文革十年第一阶段宣告结束的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我记述这两个历史事件，是抱着反思和分析的态度，所以改成现在这个标题还是合适的，但也不是对毛泽东晚年整个十年执政状况的反思。这次重新转载时，亦作了一点点补充，基本的思路没有变。〕

作为反思，我感到还有二个问题要说明一下，一个问题是个人口述和回忆都有它的局限性，因为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群众性运动，个人的经历毕竟是局部的。现在社会上已出版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回忆录，也有人在努力征集相关当事人口述当时的经历，这当然是一件好事，至少积累了各个层次的许多原始资料，对当代史的研究有益，这是值得去努力做好的一件事，这也是后人在国家档案之外研究文革十年这段历史最基础的资料。但是这同样有它不足的地方，因为不是每个人的口述加起来，便能等同文革十年的历史，微观与宏观是有区别的，不能混淆，因为这十年历史是有结构、有层次的，有其自身内在矛盾发展的归集，这一点任何个人的回忆录和口述不可能完整将其体现出来。当然出于不同时期、不同层次和结构的个人回忆，具有不同的历史价值。从一个人在十年这一相当长的过程讲，他在思想和行为上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一方面反映出他的地位和人际关系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为人行事和思想品位方面的变化。如何定性，还得综合各方面因素权衡分析，不能以偏概全。作为一个革命者，要终身一以贯之，这是何以为人的一个基本原则，不能总是处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状态，许多事靠忏悔是难以弥补的。再说，文学作品中比较典型的人和事，是指它能够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它的价值是个别具有普遍的意义，而且在精神上是激发人们奋发向上而不是相反，否则的话它不可能具有典型的意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不可能被长期保存下来，如伤痕文学那样单纯靠哭哭啼啼博得同情只有一时的影响，很难持久，会被时间自然淘汰，这也许是历史的必然。在某种意义上，历史是非常无情的。

另一个问题，是叙述大历史的过程中，往往会碰到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动机与效果之间往往很难一致，有的动机好，效果不好，也有动机不好，由于抓住机会却取得一时的成功。从历史发展看，二者都会留下后遗症。虽然，应然是从实然的发展中产生的，应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价值观念，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它具有更多理想主义的色彩，难免在认识上有脱离现实的一面，故应然不可能与实然划等号。实然则是生活中各种矛盾斗争的产物，从因果关系上讲，它是多元的。参预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的人员，必然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可能那么单纯和纯洁，而且人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故在运动一步步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异，与发动这场运动者的初衷不可能完全一致，那么目标与结果的某些差异甚至相反便不足为奇了，这是应然与实然发生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应然带有过多的理想主义成分，那么在实际运动中，发生背离的可能便更大了。另一个思考的视角，是运动发展过程，其组织的程度也往往决定着实然的效果。如果缺乏严密的组织系统，那往往会促使实然与应然二者之间出现较大的偏离，出现一些属于阴暗面的东西，所以才有“斗私批修”这个口号的提出，在当时就是实然与应然之间矛盾的产物。反之，如果有很强层级式的组织系统，控制着运动的进展，由于各级管理层的认知并不一致，也会束缚群众的手足，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而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涉及管理层的队伍和观念上是否一致，运动的发展不能如阅兵时列队行进那样步伐整齐，它很难齐步向前走啊。

在应然的问题上，还有一些基本的政治规矩不能动摇，这一点也很重要。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了这一点，指出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提出了“五个必须”的要求，即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共产党的政治规矩是毛泽东定下来的，那是总结斯大林联共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也是总结王明路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搞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的教训。斯大林清除异己的做法不好，他定那些案子的做法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也为赫鲁晓夫后来反对他提供了依据。这个问题，只要读一下联共党史便可以搞清楚。思想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应该通过整风，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目的。观察一个人是很难的，表面和本质往往不一致，到了关键时刻他潜藏的戾恶的本质就会流露出来，看起来很老实的人，到关键时刻就不老实了，为了私心，什么事他们都干得出来的。汪东兴一百周岁去世了，他的纪念规格不如邓力群，中央常委都没有出席，其中道理用不到我多讲了吧。讣告只能讲好话了，对一个人的历史评价完全是另一回事，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根据讣告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毛主席在晚年多次说过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搞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为我们立政治规矩，其中第二条讲要团结不要分裂，第三条讲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那个案例是否触犯了后面两条政治规矩呢？有些人缺的不仅是党性，还缺少做人的基本道理。这个要由历史来评判。

在毛主席所说的三要三不要上，无论在观念还是在做法上都不能搞下不为例。陈云讲的“下不为例”，大家都知道他在什么时候讲的，是针对什么问题讲的，所谓“下不为例”是指哪一个案例，这无须我多言。他讲“下不为例”，是因为这个“例”开得不好，违反了党的政治规矩。从建党以来的历史上看，什么是守规矩的，什么是违反规矩的，大家都很清楚。讲这个问题不是要算旧账，而是为了党的长治久安，为了今后不再发生搞阴谋诡计和搞什么突然袭击，不允许任何人再如此违反政治规矩的做法了，而且要防微杜渐，在政治规矩上要分清是非，所以这些规矩还得反复重申。如今习近平同志重提要遵守“政治规矩”，很重要也很及时。当然，无论是谁，触犯了刑律，搞贪腐盗窃，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应该依法处置，尽管你过去有功，但也不能以功抵过。违反传统政治规矩的做法，即使一时得逞，也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事件的基本是非不是靠权威或者一时的强力措施所能确定，还是靠真理，靠传统政治规矩才能确立，不管经历多长的时间，历史是最公平和公正的。

我记得《晋书》的《宣帝纪》有李世民为司马懿写的一篇制文，很严厉地批评司马懿为人的品德，其云：“及（魏）明帝将终，栋梁是属，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尽善之方，以斯为惑。夫征讨之策，岂东智而西愚？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故晋明掩面，耻欺伪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全文的宗旨是批判司马懿当年取代曹魏的种种做法，违反了传统的政治规矩，要知道细节，读一下《三国志·魏书》的相关篇目即可。）

### 我对文革的反思

《巳申春秋》是我八年以前作的口述，是金光耀老师和研究生邓杰帮我一起做的，前后持续了二三年时间，制作完毕以后一直放在案头，想过一段时间再来审视一下，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能否实事求是地有分析地对待往事。一般当事人写回忆录，为自己辩白的多，难免有片面性。由于我自己是历史专业出身，故我不想为自己辩白什么，只是想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并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自己经历的事件，作一番剖析，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各种因果关系，从实际效果上考核它的利弊得失，总结它所以失败的历史教训。邓小平同志说过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

“文革”十年，实际上是指毛泽东同志晚年执政的最后十年。建国以后毛泽东执政的历史时期，是可以分成二个阶段，前17年与后十年，都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阶段，都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发展的道路。这个探索不能离开国际国内大环境，它与改革开放以后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不同。对历史的分析不能离开它相应的时空条件，决不能离开那时的时空条件去苛求故人，这一点大家很容易理解，这是对相应历史时期的各个历史事件作分析时所必须遵循的前提。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为宏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他对事件的认识亦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不可能知晓事件的各个细节，这是他当时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有许多事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马克思能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二天，就能宣读《法兰西内战》的著作，总结它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由于他毕竟不是直接参预事件的当事人，而是对巴黎公社抱着同情的旁观者，这对当事者而言，也要求这样做，那就很困难了。大量的历史事件是要等待它过了许多年，事件在各个方面的结果和许多细节都充分被披露以后，才能做出比较冷静的科学的总结。故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精确判断和分析，总须要有一定的时空距离，才能实现，实时的认识很难避免它的片面性。就拿《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与“一月革命”这两件事来讲，我是身在其中，在当时很难作出完全正确的判断，一是当时自己正处于精神亢奋的状态，二是它的实际效果也需要一个时间段才能反映出来。

当事件过去40年了，各种与事件相关的资料都陆续被披露了，大多数当事人都已故世，在现实中已很少利害关系的纠结，那就有可能比较冷静的、客观的对事件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作为当事人，我更多地是从专业的视角来审视它，甚至是很冷酷地去剖析自己的往事。述往事的目的是思来者，是为后来者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如何趋利避害。中国历史上修实录是后王为前王修，而历朝历代的修史，也都是后朝修前朝的史。当然有为后朝立论的因素，但更多的因素是以史为鉴。为什么后朝能修前朝之史呢？因为摆脱了当事人的利益纠结。但是后朝修前朝史时，也不能完全离开前朝曾经的当事人。如《明史》的修订，还是离不开黄宗羲、万斯同他们的《明史稿》。李世民修前八史（指《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及《南史》、《北史》等八部史著），也是因为离开隋亡的时间不久。魏征去世时，李世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故知往事的目的是，也是为了今人行事的需要，正确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如何在如今的行事过程中趋利避害。故在这个问题上任何的忌讳都是没有必要的。那十年历史，不应成为禁区。历史很难按照判决书来写，那个判决书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所攻之一点，也不一定都准确，历史如果那样写的话，干巴巴的，没血没肉。因为历史事件不可能是单方面的故意，而是双方和多方博弈的结果。没有博弈和互动的过程，那样的历史著作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即使是审案，也要控辩双方真刀真枪地互动，才能说明事件的真相，才能使人们心服口服呀！

如果仔细分析毛泽东晚年这十年历史，它也应该分为二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从1965年10月到1969年4月，即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止，这是一个历史阶段，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到此结束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毛泽东在1967年说过好几次，在1月间，他对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说：“大概2、3、4月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还要长。”在7月13日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在8月16日，对阿尔巴尼亚专家谈话时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在9月16日，他对南萍、陈励耘说：“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7、8、9，我看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眉目了。”在9月19日，他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时说：“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1月份召开。”故在

毛心目中，九大的召开是为了结束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事实上九大是在1969年4月召开的，所以九大以后，中央文革小组也就不存在了。故严格意义上“文革”到1969年4月已结束了，笼统地讲“十年文革”这个词并不正确，九大以后实际上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毛心目中，九大以后主要的任务是在国内召开四届人大，恢复正常的秩序，从而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各级人民委员会，那时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作为过渡的机构告一段落。在国际问题上是如何处理好中、美、苏三者之间的关系，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然而林彪事件打乱了他的步骤，他不得不放下既定的计划，集中精力来处理林彪的问题，而“913事件”实际上宣告了“文革”的失败。我们知道《516通知》中的焦点是关于接班人的问题，九大的党章是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的，结果林彪折戟沉沙，那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这样在“913事件”以后，便不得不花大量时间批林，说清林彪事件的来龙去脉，解放老干部，平息老干部心中的怨气，从而重新建班子，召开十大，同时花很大的力气调整国际关系，使国际国内的形势得以缓解，为以后改革开放留出了很大的空间。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遂毛的心意。所以科学地讲，应把毛最后执政的十年，应分成二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各个阶段的中心不同、主题不同，尽管后一个阶段在毛的心目中是如何巩固文革的成果，这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结果并不如其心愿，“文革”造成的新老干部之间的裂痕实际上很难弥合，毛正是在他留下的这个难题中过世的。对于这个时期相关的历史人物，也应该作具体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管运动中站在哪一边，事实上各有各的账，功是功，过是过，有的是执行路线上的问题，有的是为人品德上的问题。总之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既不是绝对否定，也不是绝对肯定，脸谱化不是好办法。对人物的品评本来是最困难的事，东汉的许劭有一个“月旦评”专门品评人物，他对曹操的品评是“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是一个活络档子。这个例子说明了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人物的潜能，在不同环境下的时代需要，会有不同的表现。从人物自身来看，还有现象和本质的区分，有的人看起来老实，这是现象，实际上并不老实，是一个骗子，在关键时刻就显现出投机取巧的本质来了。人随着其自身地位和周围环境的变化，是在变化着的，舞台艺术上不是有一项变脸的绝技吗？不仅戏剧舞台上是如此，在历史舞台上也是如此，在关键时刻某些关键人物的变脸才可怕呢！那样的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才令人瞠目以对呢！这种场合往往防不胜防，结果就变成老实人吃亏了。人物是动态变化的，所以才会有“盖棺论定”的说法。其事盖棺也很难论定，死者的评价往往牵涉到还活着的人们之间的利害关系，所以需要时间，才能透过现象看到一个人作为人的本质。为什么？为的是摆脱人事关系上相关的利害关系，“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有的历史人物之“终”要隔三代才能定论呢！至于理论观念上的问题，也得具体分析，往往包含着双重的因素，正确与错误混杂在一起，须要条分缕析。激动的年代已经过去，留下来的总结，应细心又冷静。作为历史的分析，尤其应该如此，不能把污泥和宝贵的东西一起抛掉。

我个人在毛执政的最后十年中，所做的工作，也应该分成二个阶段。前面三年，我是为“文革”这个中心任务服务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参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起，不知不觉地卷入政治漩涡的中心，滚了一圈以后，又回到意识形态领域。后面的七年，从1968年9月成立《红旗》组稿小组起，到1970年恢复写作组，直到“文革”结束，这个阶段我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服务。林彪事件，我们虽不是在矛盾的中心，然而也牵涉到不少事。“文革”结束以后，我面临的是清查和审判，及12年的隔离和牢狱生活，为此又提供给我静心读书的机会。我重读马列经典著作、毛泽东的著作和二十四史与《资治通鉴》，在思想观念和治学方法上，反而得到进步。

人的认识总要经历感性与理性二个不同的阶段，历史的研究从书本到书本，毕竟都是间接知识，没有直接知识垫底，有时候很难得到真正的认识。事情亲身经历方知其甘苦，那十年的经历对我读史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为毛泽东组织标点注释古文大字本的过程中，古今之间不仅在历史与未来之间，而且在情感领域竟然可以那样沟通。所以有了那样的经



历，古史中的人物就活起来了。有了历史的底蕴，再来审视现实问题，也能更深一层透视它本质的东西。有人问我这辈子的得失如何，我认为还是得大于失，没有人生的跌宕起伏，怎能认识人生的真谛呢？有了这样的经历，我看问题，多少能深入一些。譬如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末讲：“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过去没有经历时，体味不到这句话的辛酸，有了这番经历我体味到了。在世俗的眼光下，于人于己都是如此，至于什么“文革余孽”、“刑余之人”之类称号，对我就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面对那些谤议也能坦然处之，不会与那些小人之颜色去计较什么长短了。历史上的是非，自会有定论，它不是按照什么决议和判决书来写的，那些东西的时效毕竟有限，管它们的议论干嘛，还是挺胸走自己的路，是非自有公论。从为人讲，只要没有偷偷摸摸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没有为个人的私利用骗术去损公肥己就可以了。对于那些毛主席所谓的“政治骗子”们，靠无中生有地说假话，伪造文件，即使得意于一时，我仍是嗤之以鼻的。至于个人在工作和认识上的失误，谁也难以免，当然需要改正，但那不是人品上的问题。我离开牢狱生活，回归社会，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也已25年了，回首审视这许多年自己的所作所为，我没有抛弃过自己的信仰，无论此前此后，我深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经得起审视和检验的，没有愧对我当年参加革命的誓言，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我早就把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了，凭这一点，我相信自己这一辈子堂堂正正为人的品格，这也正是我唯一可以告慰自己的地方。

□ 原载作者博客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